

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丛书
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 主编



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

——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

◎ 靳永 著

齐鲁书社

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丛书

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 主编

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

——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

◎ 靳永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靳永著. 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编.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8

(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33 - 1942 - 7

I. 书… II. 靳… III. 汉字—书法—研究方法
IV. 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1448 号

书法研究的多重证据法

——文物、文献与书迹的综合释证

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编

靳永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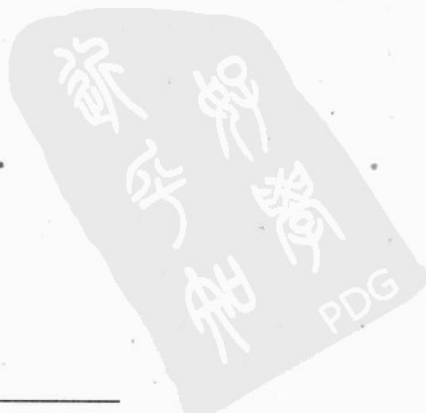
字 数 147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1942 - 7

定 价 29.00 元



前言

《前言》要说三个问题。

首先解释本《丛书》为什么以“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命名。而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从山东大学的书法文化传统、学科建设和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谈起。

1983年，经当时担任研究生处处长的孙坚奋教授的多方努力，报请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山东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增设了“文字学（含书法）”这一研究方向，蒋维崧教授是首任导师，孙坚奋教授也参与了部分教学工作。但蒋先生招生一届退休后，招生也就停止了。直到1996年，学校决定由徐超教授从训诂学研究方向转至这个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生，2001年又批准其在此方向招收博士生。2002年，学校聘蒋先生做“特聘教授”，按学校当时的想法，是希望他到艺术系去树立一面旗帜，但蒋先生一再表示：“还是留在中文系。”于是他就和徐超教授一起在“文字学（含书法）”方向招收博士生。后来，为了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学校和文学院决定成立书法艺术研究中心。当时正赶上学校进行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建设，徐超教授在申报汉语言文学学研究基地时去同蒋先生商量，决定将原先“文字学（含书法）”的研究方向改为“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而培养计划仍然按照上报教育部备案的《山东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方案》进行，即在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

之外开设有关书法方面的选修课程。

所有这些做法，大致体现了我们对书法及其历史传统，对书法人才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思考，也体现了蒋维崧教授关于书法人才教育的基本理念。对此，徐超教授做了这样的概括：（一）这样做符合学科建设的需要，也符合建立边缘学科的发展趋势。（1）启功先生说：“字是写出来的。”这句话不仅揭示了文字与书法的特殊关系，同时也使我们找到了在二者之间建立“边缘学科”的基本理论依据。（2）书法无论怎么讲“艺术”，它总还是要以汉字为书写对象。这样，文字学与书法学也就产生了内在联系。（3）历代书法和书法学文本都是用汉语汉字写成的，要研究古代文字、碑帖、书史、书论资料等，自然离不开文字训诂学。（4）从历史和现状看，深厚的文字训诂学等国学修养对书家、书法、书界和书法学科而言，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历来的文字学研究，一般都不重视书写和书法的因素，而书法家队伍中又很少有人关注和重视文字学的研究。在强调学科渗透、学科交融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有责任承担起建立这个边缘学科的任务。（二）这样做也符合山东大学的历史传统和学科建设特色。（1）将学术与艺术结合起来研究，是山东大学的优秀历史传统。从建校早期到“文化大革命”前，童书业、黄公渚、蒋维崧等先生就蜚声艺林，他们是学、艺结合的典范。（2）从1983起，蒋维崧、孙坚奋、王长水、徐超等先生都为这个创造性的研究方向做了长期努力和多方尝试，以至二十多年来，全国有类似学科设置的高校只有两家：启功教授为首的北京师大和蒋维崧教授为首的山东大学。这就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山大书法文化传统与特色。

其次要说说“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的含义。这个名称是根据徐超教授的意见提出的，蒋先生说“好”。好在哪里？好在

它能体现我们这个边缘学科的性质，可谓独树一帜；同时，将它确定为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一个研究方向时，又能给我们的招生和培养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因为这个方向实际要容纳两类考生，一类单纯研究文字训诂学，一类要将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而后来的招生和培养实践也证明，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以上是就研究方向说的，但就本《丛书》而言，因为它由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编，所以只收录与书法、书法文化相关的学术著作。

最后要说说本《丛书》出版计划及其由来。书法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时确定了两个任务：一个是教学，一个是研究。教学方面，除日常培养硕士生、博士生以外，当时就想到要办“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实际后来不久就办了。研究方面，主要是组织科研课题，但因为出版经费困难，就没有仔细多想。正在这时，蒋先生在济南中心医院对徐超教授说：“我的岗位津贴给你们中心吧，一是买些书，二是出一些学术著作。”原来，蒋先生在接受特聘教授聘任时，当场对学校有关领导说过：“岗位津贴不能要。”不能要归不能要，但学校不能不给。这期间，有几位老师给蒋先生提议办一个“蒋维崧艺术基金”。几次提出，都被蒋先生摇头否定。现在想想才知道，蒋先生说“给中心”，也不是一时的主意。中心成立时一文不名，许多事情想办都办不了。现在好了，可以去买一些大型工具书，同时也可以制定出书计划了。这部书就是出版计划中的一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类似著作能在这套《丛书》里出版。

看到这里可以知道，本《丛书》所以能够出版，完全要归功于蒋维崧教授。令人悲痛的是，现在他老人家已经不能亲眼看到本《丛书》的出版了。但我们相信，蒋老地下有知，一定

也会感到欣慰；而他的在天之灵，也将护佑着本《丛书》的出版。我们觉得，本《丛书》的出版，应该是对他老人家的最好追念。为了我们的历史，同时也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要郑重地说：我们应该记住他老人家的功德，记住他对学术和后学的关怀；同时，我们应该以他的境界和品质为榜样，沿着他的治学治艺道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来报答他老人家对我们真诚、无私的关怀和寄予的殷切期望。

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

2008年8月1日

提 要

20 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中国历代文物资料大量出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些新材料引起了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促生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学者结合传世文献,对旧有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从而引起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因为出土文物资料大部分与书法相关,学者援引出土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书法文物对比参正,综合考察,也促成了书法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与书法相关的文物资料的大量出土,极大地开阔了书法家的眼界,修正了他们对经典的理解,也引起了书法艺术创作的繁荣。

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本书建立在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传世书迹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书法研究、书法史研究和书法艺术创作进行全面反思,力图反映文物、文献等多重证据综合考察下书法研究和创作的新成果。本书努力探讨新发现下书法研究的新范式,对书法史重建的前景进行了思考,对如何结合新材料进行书法创作,从而开拓新的领域进行了探讨。

本书共五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申说本书写作旨趣,阐明研究方

法。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新材料与新学问的关系。历史上新材料的发现，常常引起新学问的诞生。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新发现，开拓了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引发了书法研究的新问题，开阔了书法研究的新视野，更新了书法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的发现，为书法研究和书法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第二节主要阐述本书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对书法研究范式的探索，即书法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合书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本书提出了“多重证据法”，即以出土文物资料、传世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与书写活动相关的物质材料与书法文物资料、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书法墨迹与刊刻资料互相释证，出土文物中的无名写本与传世经典写本、拓本互相释证，等等。多重证据之间互相补充、发明，从而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古代书写活动的真实情况，为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参照。第三节是对第二节的补充，具体说明在多重证据互相释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必须综合运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必须综合运用文物、文献等方面的辨伪知识，必须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物、文献对照考察，综合研究。

第二章“书法视野下的字体研究”：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对于字体的研究是书法研究的重要内容。汉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主要依靠手写这一书写活动来传播，从书法角度来研究汉字的字体，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是文字学家研究的重要补充。第一节主要探讨了古代字体的名、实和体、用问题。因为字体命名与字体产生时间的不平衡性，汉字的字体常常存在名、实不能对应的情况，有的是一名数实，有的是一实数名。这就常常引起人们在文献阅读时产生歧义，也常常引起文物资料与

文献资料的不对应性。一种字体可以运用到不同场合，而呈现的样式也不同，比如有潦草的手写，有郑重的抄录；有随意的刻划，有严肃的刊刻，等等。同一书体，因为应用场合的不同，抄本、刻本等呈现方式的不同，书法的美术风格差异就很大。这也是引起书体问题纷繁缭绕的重要原因。

本章第二节以小篆和古隶为例，具体阐明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未见秦代手写墨迹，对秦代的字体只能依靠文献记载来推测。睡虎地秦简等秦汉简帛书的大量出土，使人们重新审视以前的认识，对小篆和隶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小篆、隶书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小篆为战国文字说，等等。这些学说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部分地修正了前代的认识，是学术的进步。本节综合比较秦文字中刊刻字体和笔书字体两大体系，结合文字学、书法学知识，提出了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即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字体就是今天文字学者所谓的“古隶”，只不过小篆是刊刻体，而古隶是手写体。因为用途的不同，手写和刊刻呈现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美术风格的差异。本节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书体的各种名称并非起自秦代，而是迟至汉代才有书体的区分和相应的名称。

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本章的第三节对“一体二用”说做了进一步推阐。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也可以分成笔书文字与刊刻文字两大系统，其中刊刻系统包括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等。甲骨文字的契刻因为单刀、双刀的不同，美术风格也不同，其中双刀契刻的作品与某些商代青铜器铭文风格非常接近。人们所谈论的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的不同，除了时代的因素外，绝大多数是因为加工制作的工艺和材质的不同而导致的。它们在契刻、刻铸之前的稿本，应该同于笔书文字的风格。换句话

说，现在我们所见的商周时代的笔书文字，应该是当时实用文字的“体”；而甲骨契刻文字、青铜器铭文、石器铭文、玉器铭文等，都是“用”，是经过工艺加工的“变体”。本节还对字体问题上的科斗书、漆书、八分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章还从“体用”、“名实”角度出发，对字体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了对当前文字学研究的一些个人看法。当前的文字学研究，偏重对文字内部结构理据的分析，而忽略对文字外部形态的研究，尤其忽略书写活动对文字的影响。在文字演变的研究中，重视字形对比分析，而常常忽略书手个人风格的因素。这些方面的偏差在字体的研究中已经逐渐显露出弊端，应该建立书法文字学的研究模式，从新的角度进行文字学的研究，作为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补充。

第三章“多重证据法视野下的书法研究”：本章第一节从手写体与刊刻体的差别入手，进而对清代中后叶以来兴起的碑学运动、南北书派论以及当代兰亭论辩进行反思。最后，再讨论综合考察、互相释证的方法对碑帖研究的推动。19世纪中后叶兴起的碑学运动有思想上的原因和学术空气的影响，不单纯是一种书法潮流。本节以大量的出土文物为依据，论证了“南北书派分别论”的狭隘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兰亭论辩的得失进行了反思。

本章第二节探讨了书法史重建的问题。新材料的发现，首先影响到书法史学的研究。文物资料的大发现，使当代学者认识到重建学术史的必要性，并形成了文学史、美术史等“重写”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书法史的重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节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书法史重建中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以张旭、颜真卿楷书的传承关系为例说明怎样进行书法谱系的研究，以对院体的索隐为例说明怎样对一般书法现象进行研究，以对

草书写经体的研究为例说明怎样加强对规律的探讨。

第四章“文物研究与书法创作”：与书法相关的文物、文献的交互释证，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它对于当代的书法艺术创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章第一节探讨了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关系，说明学术研究的“求真”是艺术创作“求美”的前提和基础。本节从三个方面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一，学术研究为正确书写汉字提供了必要前提。因为各种原因，历代书法文物资料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错别字，这就需要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作为取舍的根据；在文字的具体运用上，需要辨明假借等，这同样需要学术研究的基础。二，学术研究为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在影响书法家审美价值观的诸种因素里，书法家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具备深远的影响。对于与书法相关的考古材料的认同，是构成书法家对文化传统态度的重要成分。那么，他接受的是这些材料中的哪一部分，对这一部分认同的程度如何，去取的态度如何，都会对他审美价值观的形成和修正产生重大的作用。学术研究去伪存真，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们的接受活动准备了必要前提。三，学术研究为书法创作提供了物质材料上的参照。物质材料对书写活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笔、简帛、纸、墨等书写工具的性质和质量影响书写活动；家具等物质材料影响执笔的姿势和运笔的方法。书法史家只有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具和家具有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切实体察彼时的书法创作。

本章第二节以古文字书法的创作为例，具体分析文物研究如何促进书法创作。只有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才能在历代积累的丰富的用笔技巧上，对古文字材料进行“改造”。经过“改造”，既要使创作出的古文字书法蕴涵传统书法美的既有因子，

又要凸显出古文字书法各个具体门类的独特因子。这就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书法艺术与工艺美术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临摹与创作的关系。前者主要针对如何取法古文字书法材料中的铭刻作品而言，后者主要针对如何取法古文字书法材料中的墨书作品而言。本节结合甲骨文、金文、篆书、古隶书等古文字书法的具体门类，对以往古文字书法创作的得失进行了反思，对当前的古文字书法创作也进行了思考。

第五章“与书法相关的物质材料的研究”：物质材料的因素，在书体的演变、书法风格的形成等诸方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忽视对与书法相关的物质资料的研究，是过去书法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缺陷。本章第一节介绍了出土的历代毛笔的具体形制，并进而分析了毛笔制作工艺的变迁带来的书法风格的变化。本节还重点介绍了从简帛到植物纤维纸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了这种书写材质的变迁带来的书法风格的变化。

本章的第二节介绍与书写活动相关的家具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执笔方法、书写姿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从战国秦汉至南北朝，人们写字时采用席地跪坐的姿势，一手执简，一手执笔。因为矮几的高度不够，人们肘、臂、腕悬空，握笔的姿势类似于今天执钢笔。到唐宋时期，桌子代替矮几，人们已不再席地跪坐，而是垂足坐在凳椅上。与此相应，执笔法也发生了改变。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书法风格的变迁。

目 录

前 言	1
提 要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新材料与新学问	1
第二节 多重证据法与书法研究	6
第三节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0
第二章 书法视野下的字体研究	33
第一节 古代字体的名、实和体、用	33
第二节 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	40
第三节 对“一体二用”说的推阐	83
第三章 多重证据法视野下的书法研究	95
第一节 多重证据法视野下的书法本体研究	95
第二节 多重证据法视野下的书法史“重建”	105
第四章 文物研究与书法创作	126
第一节 学术与艺术	126
第二节 文物研究与书法创作 ——以古文字书法为例	136
第五章 与书法相关的物质材料的研究	147
第一节 文具对书法活动的影响	147
第二节 家具对书法活动的影响	154
参考图版	159
主要参考文献	183
后 记	19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新材料与新学问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20世纪以来,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如殷周甲骨文、金文,战国、两汉简牍帛书,敦煌遗经,六朝墓志,等等。这些新材料极大地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引发了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开阔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更新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催生了学术研究的新学派。人们甚至说,20世纪是新材料、新方法的世纪。的确,正是因为新材料的发现和提出,20世纪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

新材料的发现,常常促生新学问。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待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经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也。^①

汉代孔壁遗书的发现，引起了经古文学的产生；西晋汲冢竹书的出土，促进了文献学的繁荣；北宋对古器物的研究，导致了金石学的诞生。历史上这些大规模的学术新潮流的引发，无不发轫于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先生清楚地认识到新材料的发现和学问的产生之间的关系，他敏锐地把学术视野投向当时刚刚发现的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遗书、大库档案等，并在这些新的学术领域拓荒，从而引发了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学术新潮流。人们常常援引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②

按照陈先生的说法，能否取用新的材料来研究新的问题，是衡量学术品格和境界的一个标杆，决定学术研究能否“预流”。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新材料的关注和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且使原有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更新了研究范式，甚至改变了学术格局。在语言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工艺、美术等各个领域的研

^① 《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究，都出现了新的面貌。^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仅仅依靠传世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不足和偏颇，“重建”学术史成为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书法研究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新发现、新材料面前，书法史上大量的空白需要填补，既有的结论需要重新审视，研究的范式需要转型，创新的价值讨论需要重估。一言以蔽之，无论书法研究抑或书法创作，书法学抑或书法史学，都需要“重建”。

新材料的发现，开拓了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书法史研究的上限止于两周金文。对于金文书法，也仅限于清代极少数金石学家和收藏家的零星、偶发的研究。因为材料的匮乏和缺失，大多数对于秦前书法的研究，还是依靠想象，或是辗转因袭。而这些重大发现，把我们研究的触角伸向了遥远的殷商时代，因为材料丰富多样，研究的成绩也就信而有征。人们对战国简帛书、两汉隶书、六朝以迄隋唐写经的研究等等，也都是全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新材料大大丰富了书法研究的维度，延伸了书法研究的广度，挖掘了书法研究的深度。

新材料的发现，引发了书法研究的新问题。传统的书法研究，因为材料的限制，只能在传世书法作品和典籍文献上下工

^① 举例来说，古文字学的发达完全依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即使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也因为新材料的发现，从而赋予了当代学者超越清儒的可能。比如朱德熙、裘锡圭等先生的一些论文，就很好地利用了考古新材料，解决了一些老问题。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援引文物资料考察古典文学中的名物问题而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比如扬之水先生的《诗经名物新证》和《古诗文名物新证》两部著作。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材料的发表，使人们重新反思儒家、道家思想，对先秦哲学提出了价值重估。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则有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等著作，依据文物资料考察思想史上的“一般信仰”，从而引起了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变革。大量古文献的出土，使文献学研究走出“疑古时代”，开始了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比勘，从古代服饰入手，解决了古代工艺、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问题。孙机、杨泓等人关于文物与美术的著作，也成功地把文物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传世文物研究有机结合，做出了很好的成绩。